

赫尔曼·戈林

[英] 罗杰·曼维尔 著
钟 璜 钱秀文 译
王 敏 李兰琴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第一章

青年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1893年1月12日，赫尔曼·威廉·戈林出生于德国。他的母亲在巴伐利亚一所疗养所生下他六个星期以后，就把他托付给别人照管，她自己回到了在海地任职的丈夫身边。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博士曾经是一名骑兵军官，任德国驻海地总领事。他第二次结婚时已四十五岁，在伦敦研究英国的殖民地管理。他的妻子弗兰齐丝卡是一位出身低微的巴伐利亚姑娘，婚后不久随丈夫去德属西南非洲。戈林博士在那里结识了策齐尔·罗德斯。他在那里还同一名曾为弗兰齐丝卡第一个孩子接生的犹太医生赫尔曼·爱彭斯坦结为知交。赫尔曼·威廉·戈林是弗兰齐丝卡的第四个孩子。这位总领事因结婚两次不得不抚养九个孩子。

1896年戈林博士即将退休以前，带着妻子返回德国，回到了他们的小儿子赫尔曼身旁。由于儿女成群，全家节衣缩食，在柏林市郊渡过了生活简朴的五年。赫尔曼是一个固执任性、难于管教的孩子。五岁时，父亲送给他一套海盗服装，他欣喜若狂。每当有军官来他家作客，老保姆总是把他们的佩剑和帽子偷偷拿到赫尔曼的房间里，让他玩耍片刻。那时候他已梦想当一名军官。

一桩意味深长的事件影响了他以后的生活道路，使他后来孜孜追求似乎同他的门第相称的、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戈林的母亲风华正茂时，无疑厌倦同衰老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于是找了一个情人，即戈林全家在非洲结交的朋友爱彭斯坦。爱彭斯坦那时也回到了德国，他富有、鳏居，想在退休之前获得骑士封号和领地。他与戈林博士重叙友情时——当然主要是与弗兰齐丝卡叙旧——他已经被赐予冯·爱彭斯坦骑士的贵族称号。爱彭斯坦是戈林家孩子们的义父。戈林一家住在柏林时不需要交付房租，因为房东就是爱彭斯坦。爱彭斯坦回德国后对戈林一家备加照顾，把这个每况愈下的家庭作为常住客人接待。

爱彭斯坦拥有德国—奥地利边界的毛腾多夫宫殿以及费尔登斯坦城堡。这座城堡在纽伦堡东北方向约 30 公里，是在十一世纪一座旧城堡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爱彭斯坦把这座城堡提供给戈林一家作为栖息之所。弗兰齐丝卡和丈夫怀着感恩之情举家南迁，随行的有赫尔曼的哥哥卡尔、姐姐奥尔加、保拉，以及他的弟弟阿尔伯特。弗兰齐丝卡作为爱彭斯坦的情妇在费尔登斯坦过着隐秘的生活。年迈的丈夫只能“迎合”城堡主人，满足他的需要。爱彭斯坦经常来访，他和弗兰齐丝卡在一间精美绝顶的卧室里共享欢乐，而戈林博士却不得不睡在城堡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

年方八岁的戈林还不能理解这类事情。长大以后，他也认为“宫殿”属他家所有，富丽堂皇，有古老传统的陈设，这一切同他父亲一直穿戴的外交官服饰十分相配。赫尔曼·戈林后来还说他从小就当“领袖”，所有同他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包括哥哥姐姐，都聚在一起拥他为王；他也曾通过勇

敢的爬山比赛显示自己的胆量。戈林年轻时是一个热衷于登山
的优秀运动员。

弗兰齐丝卡·戈林做爱彭斯坦的情妇达 15 年之久。爱彭斯坦在某些方面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古怪人，根本不能成为义子赫尔曼的楷模。爱彭斯坦作威作福，要求戈林全家遵守他的时间安排。事情竟然发展到这等地步：开饭时，如有人迟到，他就会勃然大怒。他非常注重等级之分，宁愿外出旅行或游手好闲，也不愿重操医生的旧业。爱彭斯坦为青年时代的戈林提供了金钱的保障、生活的照料，并向戈林灌输了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这种状况维持到 1923 年——赫尔曼 20 岁——爱彭斯坦和弗兰齐丝卡分手为止。

戈林在幻想世界中成长。他的“文化”是日耳曼英雄的文化，他尤其喜爱骑士的照片和历史伟人如查理大帝和腓特烈大帝的画像。关于这些伟人的故事，他百听不厌。孩童时代的戈林被送进安斯巴赫一所管理很差的寄宿学校，在学校里他曾组织学生进行过一次罢课。他经过与双亲的长期斗争，终于获准离开那所学校。他自称是“一个应该受到尊重的青年贵族”。他的祖先中，最使他钦佩的是太祖父米夏埃尔·克里斯蒂安·戈林。他曾任领地事务的顾问，腓特烈大帝派往地方和工厂的全权代表。戈林对太祖父的钦佩促使他后来决心要成为掌管第三帝国经济的独裁者。他也终于如愿以偿。

父亲海因里希·戈林参加社交活动以及照相时，总爱戴着老式的三角制服帽，样子滑稽，引人发笑。直到戈林知道他的家庭是怎样依赖爱彭斯坦以前，这位肥胖的、作威作福的爱彭斯坦始终扮演着一个仁慈的父亲形象。后来戈林散布说，他小时候曾放狗追咬邻近居住的犹太人。不管这种说法

的真实性如何，说明戈林是一个固执任性、缺乏教养的男孩，他纯粹仗着他的莽撞和登山术才恒赫出名。后来还有很多关于戈林青年时期冒险行为的传闻，其中有一些是真实的，比如说戈林愿意扮演士兵，即使引起殴斗，他也毫不退缩。戈林唯一喜爱的学校是卡尔斯鲁厄的士官学校，他12岁时被送进该校。他16岁进入柏林附近利希特费尔德的士官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对文化生活和社交活动都感到称心如意。

戈林在学校严守纪律，毕业时还受到了表扬。1912年他进入威廉王子的巴登步兵第112团，驻扎在阿尔萨斯的米尔豪森。19岁时，戈林少尉曾返回费尔登斯坦炫耀自己的戎装。他对家人说：“假如战争爆发，我一定能经得起考验，为戈林家族增添光彩。”

戈林幸运地开始了军官生涯。而在费尔登斯坦城堡，戈林一家和爱彭斯坦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弗兰齐丝卡和爱彭斯坦之间原有的爱情关系已经烟消云散，龃龉不时发生，最后终于爆发了公开的争吵，爱彭斯坦把戈林一家逐出门外。这样，戈林全家于1913年——战争爆发前一年——迁居慕尼黑。此后不久，海因里希·戈林在慕尼黑去世。他的儿子赫尔曼身着军装，站立在父亲墓旁凭吊，百感交集，潸然泪下。在费尔登斯坦精心建立起的戈林之家的威望，如今竟寄托在海因里希·戈林的儿子赫尔曼·戈林少尉身上！

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卓越。他所在部队的驻地米尔豪森被法国军队占领，步兵团撤退到莱因河一侧。他两次率领突击队进入米尔豪森，第二次骑自行车进城时，他九死一生，得以逃脱。随后戈林接到调令，被派去守卫一个被法军占领的村庄中一座教堂的尖塔。他勇敢善战，颇有胆略，

很快成为一名有经验的军官。他的挚友布鲁诺·勒尔策尔少尉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被批准去接受飞行员训练，而戈林在战壕里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一度丧失服役能力。但他竭尽全力，争取也能加入飞行员的行列。当戈林要求调动的申请遭到拒绝以后，他以其固有的果断胆略擅自调换工作，自愿承担后果。他走上军事法庭，被判处三个星期的营房禁闭，但是却实现了自己的志向，留在这个新的兵种——德国未来空军的雏形部队。

德国的空军部队当时还处于初创阶段。勒尔策尔和戈林作为飞行员和观察员驾驶的第一架飞机，是他们“想方设法”弄到手的（实际上是偷来的）。最初，他们只做一些侦察飞行。飞行时，勒尔策尔低空盘旋于敌人阵地上空，戈林并不开枪射击，而是伏在机舱里拍摄敌人的军力部署设施。他们有时还扔下所谓“空中之鼠”的小型炸弹。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储任第5军总司令后，勒尔策尔和戈林被编入第5野战飞行第25大队。由于他们机智勇敢的侦察飞行，不久荣获一级铁十字勋章。勒尔策尔——戈林飞行小组逐渐出了名。他们经常被邀请参加高级军官的形势讨论会，讲解他们侦察飞行中拍摄的照片。

戈林雄心勃勃，一心想自己驾驶飞机。他从弗赖堡航空技术工厂的飞行员学校毕业以后，1915年10月驾驶一架新型的通用电气公司飞机重返前线。1915年冬，有一天戈林驾驶战斗机单枪匹马地向一架英国的汉德莱-佩奇大型飞机发动进攻，突然碰上了索普威思战斗机飞行中队的袭击。《戈林传记》的作者马丁·格·索默菲尔德写道：“又一束炮弹击毁了机翼，几发炮弹命中发动机，子弹擦伤了他的腿部，几

秒钟后他的右臂中了一发可怕的子弹，他受了重伤！……戈林采取平生最紧急的俯冲，把飞机降到低空飞行。他真走运！众多的敌机在追击互相干扰……戈林用尽平生力气，在一个公墓旁着陆。公墓的正中是一座教堂，屋顶上挂有红十字会的标记，因此可以说他是在手术台上着陆的。几分钟以后他已昏迷不醒，动了手术。”

戈林在野战医院几乎卧床一年之久。1916年他经历了柔情蜜意的初恋，差一点就要订婚。但是，姑娘的父亲——一位富豪地主——对这位机智的青年飞行员的前程并不寄予厚望，不同意他们订婚。戈林伤势复元后重上蓝天。这时，他断定德国飞行员在公众眼里已经成为空军英雄。尤其是战斗机飞行员被作为富有浪漫色彩的英雄登在报上，还出售印有他们肖像的明信片。里希特霍芬和乌德特等人的名字无论是在敌人中间，还是在朋友中间都赫赫有名了。戈林立志同样要成为一个著名的战斗飞行员。在科尔马的战斗机第26飞行中队服役的勒尔策尔把戈林调到自己身边。戈林在同法国战斗机的一次空战中救了勒尔策尔的性命，几天后勒尔策尔报答了他的救命之恩。

敌我双方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一交手就象装上翅膀的古罗马斗士那样战斗。他们为自己的勇敢无畏感到自豪，轻蔑地俯视着地面上战斗在沟壕泥泞中的步兵。1917年起，印有戈林肖像的明信片也出售了。戈林获得了三枚勋章——标有橡树叶和剑的蔡林根狮子勋章；卡尔·腓特烈军事骑兵团骑士十字勋章；带有利剑标志的霍亨索伦家族勋章。1917年5月，戈林被任命为战斗机第27飞行中队队长。由于战争需要，该中队很快成为由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指挥

的战斗机第1飞行大队。

1918年5月，戈林荣获一枚最令人向往的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这种勋章只授予获得25次空战胜利的勇士。戈林虽未达到这一成绩，但他作为战斗机飞行员的勇敢是毋庸置疑的。戈林的功绩远远超过一般水平，因此作为久经考验的飞行员，他荣获了这枚勋章。战争中，战斗机飞行员的寿命大大缩短——里希特霍芬于1918年4月阵亡；他的继任人赖因哈德上尉作为飞行大队指挥员在7月试飞一种新型飞机时机坠入亡。1918年7月14日，戈林担负里希特霍芬战斗机飞行大队的重任。我们从一份现场报道中得知，戈林那时曾作了一次演讲，以纪念那些为保持飞行大队的荣誉和战斗精神而阵亡的将士。他的演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戈林又被授予“飞行大队手杖”。这是一根专为里希特霍芬制作的、散步用的手杖。他的继任人赖因哈德只享用了几个星期。戈林所写的一份工作报告可以使人们了解当时空战的一些情况。里希特霍芬战斗机飞行大队在该队存在的最后九个月中击落了五百多架敌机。报告写道：

“英国的单座战斗机大多根据不同高度，以中队为单位排列成好几种强大的阵容，很有经验地进行战斗。与此相反，法国的战斗机很少飞越前线，避免任何一次严峻的战斗。而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法国的双座战斗机总是紧密排成强大的队形，有的经常肆无忌惮地在低空进行轰炸。法国的双引擎战斗机柯德雷恩特别引人注目。这种飞机的钢甲是经过反复试验的，不易被我们的炮弹打穿……1918年7月15日，我从最近的距离向一架柯德雷恩发起攻击时，几乎消耗了我的全部弹药，这架柯德雷恩却若无其事，继续安然飞走。同

这种装备良好的、披着钢甲的飞机进行严峻的战斗是需要作出巨大牺牲的。人们必须首先训练高炮部队来对付柯德雷恩。因为它们飞行时常常排列密集，成为高射炮的有利目标……各个飞行中队有时白天要起飞五次。飞行员和飞机都不能长久坚持这样紧张的工作……。飞行大队和战斗机组之间缺乏直接的通讯联络，造成它们很难协同作战。无论如何必须在进攻之前完成部队急需的通讯建设。”

次日，戈林又报告说：“1918年7月18日上午8点15分，我向几架斯佩特进攻。我迫使一架斯佩特向下飞行，在盘旋中将它击中，使它坠落在圣·班德里附近的森林峡谷之中。”

1918年秋季，第一次世界大战逐渐接近尾声。年方25岁的戈林从空战理论到实战中，指挥着一支名扬四方的战斗机飞行大队。在这种情况下，戈林是否有很多时间从事政治活动，是令人怀疑的。戈林的出身和教养使他成为政治上的右派人物、无政府主义者、军国主义者，他是一名荣获高级勋章的军官，还是一位绅士。作为自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名成员，他和很多对德国实际境况感到迷惘的德国军官一样，对1918年10月德意志帝国的突然崩溃毫无准备。传说德皇将退位，海军哗变，陆军（自认为“在战场上不可战胜”）内部纪律松弛，骚乱迭起。戈林自然知道在俄国爆发了革命，但对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并不完全清楚。11月初，由于天气恶劣，他的飞机几乎不能起飞，踌躇不决的德军统帅部发布了自相矛盾的命令，激怒了这位年轻的前线指挥官。

11月11日，停战生效。戈林召集了他的飞行员。执拗地向他们说明，关于执行把飞机如数交给法国人的命令，他

将不予考虑。有几架飞机按照命令转移到斯特拉斯堡，飞行员在降落时故意毁坏飞机；其余的飞机——除几位飞行员由于疏忽在曼海姆市降落外——都在戈林指挥下向达姆施塔特市飞去。戈林要求曼海姆机场的工兵代表会交回在那里着陆的军官的武器，如不从命，戈林就要用机枪火力向该机场发动进攻。傍晚，他在战斗机第一飞行大队的战斗日记中写道：

“11月11日。停火。飞行大队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飞到达姆施塔特。大雾茫茫，飞行大队自成立以来已取得644次空战胜利。

“空战损失共计为：56名军官、飞机驾驶员和6名士兵死亡；52名军官、飞机驾驶员和7名士兵受伤。

飞行大队指挥员赫尔曼·戈林中尉（签字）”

戈林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作为少尉和中尉指挥着飞行大队，等他离开部队时已升为上尉。他的理想世界已经崩溃。德国各地区零星爆发了共产党人的起义，因此戈林所信仰的社会制度受到了威胁。军官们害怕遭到殴打，不敢再穿军装在大街上行走。德皇已经退位。德军统帅部已经瓦解，由文职人员仓促组成的资产阶级政府签署了停战令。这次停战后米被军界称为向德军背上“捅了暗剑”，这导致了《凡尔赛和约》的签订。飞行大队的飞行员们在阿沙芬堡复员时，戈林象他的同僚一样未得分文复员费和任何补偿就被免除了职务，变成了失业者。

在各奔前程之前，戈林和他的军官们举行了一次告别酒会。会上，他们对部分同胞的“卑劣行径”怨言不绝。德国

似乎在走向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道路——在一些德意志联邦和城市，社会主义者已经执政。戈林感到有必要就当前形势作一次正式演讲，并声称他的演讲一定能引人注目。

戈林在演说结束时说：“自由、法律和道义的力量最终必将获胜。我们将为反对奴役我们的列强进行斗争。我们必将胜利。里希特霍芬飞行大队的特点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平时期同样可以体现，我们的时代必将再次来到。”然后，他举杯说：“先生们，我为祖国和里希特霍芬飞行大队干杯！”他一饮而尽，随后把酒杯摔得粉碎。所有的军官都跟着这样做了。

戈林回到慕尼黑生活贫寒的母亲身边。戈林自己失业了，几乎不可能有就业的希望。戈林和乌德特一度受到在慕尼黑服役的英国皇家飞行队弗兰克·博蒙特上尉的关照。战时，博蒙特击落两架德国敌机以后，被迫降落在德国阵地的后方，戈林曾经按照不成文的飞越前线的飞行员友谊条例“保护”过博蒙特。

戈林感到，他在一个共和制的德国是不会找到称心的工作的。他身穿上尉制服，佩戴着最高战功勋章，参加了柏林的一次军官集会，为的是驳斥新任国防部长瓦尔特·赖因哈特将军的要求。他要求所有与会者支持共和国——不佩戴具有挑衅性的军衔标记。将军讲完之后，戈林发了言。埃里希·格里茨巴赫在一本半官方性的《戈林传记》中重述了他的发言：

“国防部长先生，我料想您今天可能出席这个集会。但是我希望在您的臂上看到戴孝的黑纱，以表示您对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所作所为的耿耿忠心。可是您的臂上却佩戴了蓝色

的条带。国防部长先生，您应当佩戴红色条带不是更好吗？”

戈林的结束语博得了不少同伴们的赞赏：

“我们军官们有四年之久在水上、陆地上、空中恪守职责，为祖国献身。现在我们回到家里，人们又是怎样对待我们呢？人们唾弃我们，还要夺走我们的荣誉。我告诉你们，人民不应对此负责。我们同人民是战友，我们同每一个人，不论属于哪一阶层，都经历了四年战争的艰难岁月，我们是患难与共的。不是人民，而是唆使人民进行战争、并向我们伟大军队背后插上利剑的那些人，他们一心追求高官厚禄，牺牲人民养肥自己。……这一天终将到来，我深信这点，我也请求你们相信这点，因为这些先生们已经要尽花招，我们一定要把他们驱逐出去，逐出我们的德国。为此你们必须武装起来，为了这一天武装自己，努力工作。这天终将到来！”

戈林被迫退伍回乡后，想把他的飞行员才华施展于地方。偶然的一次巧合使他时来运转：他在哥本哈根一次航空节上表演了驾驶福克 F7 型单座机，为酬谢他的表演允许他使用这架飞机。戈林以特技飞行员的身分崭露头角，举办短途环城飞行，游客每人收费 50 丹麦克朗。戈林在丹麦很有声望，许多人不惜出高价同这位誉满全国的飞行员遨游蓝天。戈林生活宽绰，寻欢作乐。他仪表堂堂，未婚，常被邀请参加社会活动。尽管戈林是“军官和绅士”，但在大庭广众之中举止相当鲁莽，喜欢公开宣扬自己的政治信仰。他还神魂颠倒地爱上一位有夫之妇，由此招来的丑闻促使戈林很快出走瑞典。但是他到那里，主要是因为瑞典成立了一个航空公司。他成为斯文斯克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并兼任德国海尼肯降落伞公司在瑞典的经销代表。

戈林就任新职后，也驾驶小型包租飞机。1920年冬，学者埃里克·冯·罗森伯爵临时聘请戈林作一次前往他的城堡的飞行。路程不远，飞行却相当艰难，因为必须在暴风雪中飞越一望无际的森林和湖泊。戈林确是一位敢冒这样危险的飞行员，罗森是乘客，两人在飞行中迷了路。夜幕降临之前，戈林终于幸运地降落在罗森的罗克尔施塔特宫附近封冻的巴文湖面上。戈林当晚被邀在那里过夜。

他们终于到了罗克尔施塔特宫。映入戈林眼帘的骑士装备、挂在墙上的猎物和祖先遗像，表明在这里生活的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古老家庭。这时戈林显然活跃起来了。楼梯旁陈设着罗森自己用矛刺死的一只大狗熊标本，壁炉里的火焰光亮夺目，在用卐字形装饰的铁制薪架上烧着木材，这些对罗森伯爵说来只是象征他青年时期的个人幸福。戈林当时也许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最古老、最广为流传的太阳的象征——卐字形。不过更引起戈林注意的是到罗克尔施塔特宫来作客的、模样俊俏的伯爵的妻姐：卡琳·冯·坎佐夫。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象仙女下凡一样从宽阔的楼梯上走下来。

卡琳的妹妹维拉莫维奇·米伦道夫·芬妮伯爵夫人，后来在一本爱情小书里描写道，这是浪漫主义的一瞬间。芬妮说，虽然三十二岁的姐姐比戈林大五岁，但戈林却对她一见钟情。戈林是一个多情的浪漫主义者，容易沉迷于感情的冲动。他和罗森一家唱着德国和瑞典的民歌，罗森用吉他伴奏，一直持续到深夜。

戈林与卡琳的来往是戈林生涯中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卡琳的父亲卡尔·冯·福克男爵是瑞典的一名军官，母亲赫尔迪尼·博密希·福克男爵夫人是一位在爱尔兰长大的怪僻

的英国女人。福克男爵曾在“冷流卫队”中服役，男爵夫人却能超脱民族的偏见。男爵夫人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基督教信仰者，领导着一个由她的母亲（也生活在瑞典）创立的基督教妇女会，即所谓鼠麴草协会。妇女会的小教堂设在斯德哥尔摩市格雷夫-特雷-加登区筑有围墙的福克家花园里，周末时在那里集会祈祷、忏悔和演奏音乐。妇女会仅由少数女友组成，小教堂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卡琳理所当然也是鼠麴草妇女协会的成员。

戈林同卡琳在斯德哥尔摩重逢时才体察到卡琳的秉性。这位在戈林眼中容貌出众、性情温文尔雅、头发呈棕黄色的卡琳已同丈夫尼尔斯·冯·坎佐夫伯爵完全分居，他们有一个名叫托马斯的八岁的儿子。伯爵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象卡琳的父亲一样是个职业军官。两人结婚已有十年。卡琳虽有英国血统，但却完全习惯于德国的生活方式。卡琳的姐姐也嫁给了一名德国军官，姐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卡琳·冯·坎佐夫倾慕这位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勇敢无畏、令人敬佩的青年上尉。而戈林一向放任自己的情感，当卡琳的母亲第一次向他炫耀她的小花园教堂时，他就皈依了基督教。

卡琳爱戈林越深，她本人的处境也越困难。她的家族内部的关系密切，福克家和罗森家都不愿发生离婚这类事，但是戈林决心有朝一日娶卡琳为妻。1921年，戈林返回慕尼黑探望母亲，想找一个比飞行员更可靠的职业。于是28岁的戈林进入了慕尼黑大学攻读政治学。卡琳跟随他来到德国，并决定向自己的丈夫提出离婚。尼尔斯·冯·坎佐夫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大度，给卡琳一笔年金，让她经济上获得独立。

1923年2月3日卡琳在慕尼黑同赫尔曼·戈林结了婚。

戈林回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当时在德国，一些有民族意识的人士总是对《凡尔赛和约》的条款不满。为了表示重振德国威望，甚至复辟君主政体的政治欲望，一些民族主义政党纷纷建立起来了。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也在这时建立起来。当时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相当脆弱，1922年暗藏的暴乱者充塞着街头。

1922年秋，戈林初次聆听了希特勒的讲演。后来，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战犯的法庭上叙述了他第一次见到希特勒的深刻印象：

“我打听到确切消息，知道我在星期一傍晚的集会上能听到希特勒的演说，因为那时他每星期一晚上总要举办集会。我赶到会场，希特勒正在谈论《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表示他断然拒绝《凡尔赛和约》的态度。

“希特勒谈到，象星期日那样的空洞抗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们必然把抗议当作一种通常的议事日程。有了能给予抗议有力支持的政权，抗议才会取得成果。在德国还未足够强大以前，抗议是没有意义的。

“希特勒的见解字字句句讲出了我的肺腑之言。几天后，我直接来到纳粹党总部。那时，我根本不了解纳粹党的纲领，也不知道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政党。我曾仔细观察过其它一些党派。国民会议选举时，我怀着完全脱离政治的见解选举了民主派。然而，当我看到我选举的是何许人时，我开始同政治若即若离。现在，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具有明确而坚定目标的人。我想先同他谈谈，问问我能否对他有所帮助。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凡尔赛和约》。我对他说，我的全部思想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为反对《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进行斗争，在这点上他能够完全支配我这个人，支配我本人和我所有的一切。”

希特勒显然需要吸收象戈林那样的人参加他的纳粹党，以提高纳粹党的水平。

当时戈林 29 岁，他手下又开始有了一帮听命于他的人。但他们已不是德国空军军官和部队，而只是希特勒第一批主要从失业者招募来的冲锋队员（SA）。

第二章

政变与流亡

希特勒谈到戈林时说：“我交给他的是一群粗野的乌合之众，但他在很短时间里就建立起一支为数 11,000 人的部队。”戈林自己这样讲：“至关重要的是，首先把冲锋队员紧密地团结起来，训练成为一支服从命令并可以信赖的队伍，执行我和阿道夫·希特勒发出的一切命令。”

希特勒那种救世主的口吻和演说，使戈林对德国的未来重又充满信心。他并不计较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是一名下士，出身低贱，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而戈林自己却是一名外交官的儿子，在城堡长大，又是受过表彰的战斗机飞行员，还差一点同一位男爵夫人结了婚。戈林的未婚妻拥有一笔不算丰裕的收入，所以戈林还必需充任贸易代表以增加进项。同时，戈林从事政治活动占用他的时间越来越多。

婚后，戈林夫妇迁入慕尼黑市郊上门青克的一所小房子。神秘的卡琳举止温文尔雅，经常接待希特勒及其朋友们来家作客。属于这个朋友圈子里的人有拘谨固执的鲁道夫·赫斯，他在战争结束前刚学完军用飞机驾驶技术，并于 1921 年参加了纳粹党；还有犟头倔脑的恩斯特·罗姆上尉，他自认为